

【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乡村数字反哺的代际合作与行为选择*

伍麟 朱搏雨

摘要:农村青年帮助农村老年人融入数字社会是建设数字乡村的重要内容之一,它能够起到促进村庄治理现代化以及实现积极老龄化的基础作用。乡村家庭的数字反哺存在维护经济利益、重组家庭政治以及开展日常生活等三重合作基础。数字反哺的代际行为表现出数字技术学习注重实用性、沟通传授中物质支持与情感支持并重、隔代反哺以及反哺时间集中在节假日等特点。调动家庭内部资源进行数字反哺是有效提高农村老年人数字素养的家庭策略之一,不仅可以提高农村家庭的发展能力和生活质量,也有助于实现家庭的发展目标。乡村老年人数字素养的初步提高,既有利于他们融入数字社会,也可以使青年人担当起代际责任。

关键词:代际合作;数字素养;数字反哺;家庭策略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2)05-0057-09

一、引言

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关注老年群体在数字化背景下的社会适应问题。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网民年龄结构中60岁及以上网民占比仅为12.2%;网民城乡结构中农村网民占比仅为29.4%。^①无论从地区还是从年龄结构看,农村老年人都属于数字素养的弱势群体。由于视觉衰退、动作迟缓、知识不足等客观原因,农村老年人在学习和使用数字技术、提高数字素养以及适应数字社会等方面面临诸多现实困境,解决好上述问题需要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体共同努力。其中,家庭层面数字反哺的重要性日益显现。

近年来,关于数字反哺的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已有研究主要从年长者需求角度出发,关注子代基于回应求助义务而采取的反哺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问题。^②这些研究较多关注作为需求方的老年群体,考察他们对数字技术的认知

特点、情感反应和实际操作,较少关注子代群体参与数字反哺的家庭责任、发展策略及代际情感等方面。从学科研究来看,大多从传播学视角出发研究数字反哺,社会学视角的探究较少。^③从研究对象来看,探究亲子两代之间发生的数字反哺的研究较多,关注家庭中的隔代反哺建构机制的研究较少。^④从研究内容来看,关注数字反哺的发生动因、类型划分、影响因素及行为结果的研究较多^⑤,从家庭策略理论以及动机—行为视角关注子代选择数字反哺的心理动机与行为策略的研究较少。

在数字化社会背景下,乡村青年作为中坚力量逐渐承担起家庭发展的主要责任。为了实现家庭发展目标,发挥家庭成员的主体性与能动性,需要对家庭劳动力和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积极做出调适以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壮大家庭经济实力。从乡村的实际情况出发,由于村庄公共性存在缩减的趋势,动员和激发家庭内部资源开展数字代际反哺是提高农村老年人数字素养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⑥乡村数字反哺是农村家庭代际双方基于家庭发展主动进行的

收稿日期:2022-0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研究”(18VZL009)。

作者简介:伍麟,男,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72)。

朱搏雨,女,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生(武汉 430072)。

学习活动,返乡创业、节假日返乡以及原本在乡的二三代人口是参与数字反哺的关键力量。在国家建设数字乡村的时代背景下,对于农村家庭基于何种生活策略、采用何种行为选择对老年人开展数字反哺以及维持代际合作进行研究很有必要,可以丰富农村家庭生活策略的实践及理论研究。

笔者于 2021 年 4 月对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南的村庄进行实地调研。调研地属于典型的中部村庄,村庄人口结构、经济状况以及文化传统均与大部分中部农村相似,因此我们选取的田野点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调研中我们通过参与观察法了解农村家庭中代际的日常互动,利用深度访谈法了解农村家庭数字反哺发生的合作基础与行为策略,选取“90 后”乡村青年及其父代、祖代作为主要的访谈对象。由于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在生理条件和认知能力方面存在差异,可能导致数字反哺呈现不同的建构机制及反哺特点,因此本文将老年人划分为低龄老年人与高龄老年人进行对比分析。低龄老年人主要是研究对象中的“父代”,高龄老年人则是其中的“祖代”。访谈内容围绕乡村青年为何以及如何教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青年人在数字反哺过程中的策略安排与情感体验、数字技术对老年人有何影响等问题展开,从而探讨在农村家庭中开展数字反哺的代际合作基础与行为策略。

二、乡村数字反哺的现实需求

当前数字技术已经逐步渗入广大农村地区,建设数字乡村是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在“半工半耕”发展模式下,大多数农村青年进城务工,老年群体在乡村中占据很大的人口比例。由于缺乏数字素养,老年群体在村庄治理现代化、数字乡村建设、实现积极老龄化以及数字隔代照料等方面均处于弱势地位。因此,需要对农村老年人进行数字反哺,帮助其顺利融入数字社会,这对于老年人自身、农村家庭以及乡村社会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

1. 老年人村庄数字参与不足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助推乡村基层治理数字化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乡村社会也逐渐依托微信群等数字媒介的现代化治理方式,优化村庄治理效率,加强村民间的社会联系。微信作为即时通信工具在其中发挥了巨大效用,学者们将其概括为“微自治”。微信群将多元主体融入一个“共同场

域”,能够强化村民之间的社会关联,从而构建新的村庄秩序。^⑦这些多元主体包括外出务工人员、村庄在乡精英、无固定职业者以及村庄留守妇女等,并未将老年群体包含在内。大部分农村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年人没有微信,无法加入村庄微信群,很难参与村庄的“微自治”。他们既没有数字接入的机会,更没有数字参与的技能,因为缺乏技术赋能在数字治理过程中处于日益被边缘化的状态。关于微信群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以及对农村老年人的作用,学术界一般从公共交往空间与公共治理空间两个维度来加以分析。从公共交往空间来看,微信群将实体性空间转化为虚拟网络空间,帮助村民摆脱时空束缚,使在外务工的村民也有同等机会参与其中,加强社会联系,培育村庄公共精神。然而,村庄中老年人大多不在微信群中,无法参与线上虚拟公共空间的互动与互助。与此同时,村庄微信群的存在会使线下面对面的社会交往部分转移到线上虚拟公共空间中,对线下的村庄互动机会造成挤压。上述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于农村老年人,导致其社会互动与社会联系减少,产生社会隔离与社会孤立,使老年人孤独感增加。从公共治理空间来看,微信群打破了传统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状态,通过话语赋权与技术赋权,提升村民的主体性与积极性,聚合乡村公共性,线上发布村务信息,进行村务公开,突破传统“走家串户”式治理,能够节省治理资源,提高治理效率。然而,微信群中老年群体的不在场不仅使其在村务讨论中集体“失声”,无法表达其利益与需求,而且也导致与老年群体相关的事务难以通过数字化方式完成,只能采取传统方式,降低了办事效率。因而,农村老年人缺乏数字技能使其无法参与乡村的数字化治理,不利于数字乡村的建设。

2. 老年人享受数字红利不够

进入数字社会时代,文明发展和科技进步理应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平等优质的生产生活条件,老年人同样应当平等获得享受数字技术红利的机会和途径,应避免因年龄、地域歧视而将老年人排斥在数字世界之外的情况。许多研究表明,合理使用数字技术能够帮助老年人维护自身的社交网络、提高他们对健康问题的认识^⑧、加强老年人的社会融入、减少老年人的孤独感^⑨、防止老年人认知能力的下降^⑩。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很多农村老年人还不具备使用数字技术的物理条件,基本处在数字社会

的各种活动之外,在村庄数字化事务处理中时常遭遇不便与困难。而村庄的社会交往领域在信息通信技术的渗透下,也同城市一样越来越多地出现线上交往形式,一些社会互动由线下转变为线上,老年人面临参加线上社会交往的不便与线下面对面互动被挤压的现实窘况,维持以往的社交关系出现困难。如果长期缺乏社会互动的机会和场合,老年人很容易感受到社会的隔离与排斥,从而加剧老年人的孤独感,进而导致其身心健康状况的下降。显然,农村老年人数字素养处于空白或落后的状态,不符合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的要求,使老年群体难以切实平等地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数字红利。当前,农村老年群体中会使用数字技术的老年人占比远低于城市老年人,他们在数字生活中遇到的障碍更多,享受红利更少,迫切需要融入数字社会,以改变他们在数字社会中所处的不利状况。

3. 老年人数字照料能力有限

在现代社会,乡村也处于一定程度的社会竞争之中。为了争取家庭整体向上流动,避免在社会分层中处于不利地位,农村家庭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进行家庭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实现家庭扩大再生产。具体而言,年轻一代外出务工参与城市竞争,积累家庭财富,老年人留守村庄从事农业劳动,同时照顾尚且年幼还在接受教育的孙代。家庭发展策略将现实的竞争压力在家庭内部进行分解,形成“新三代家庭结构”。这些策略的目的是实现家庭经济收入的最大化,表现为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的理性劳动和生活实践。从教育来说,它不仅是个人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重要依靠,也是家庭进行社会再生产的主要途径。^①农村家庭同样需要通过教育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因而教育是农村家庭发展策略的重要部分,年轻父母对后代教育的期待较高,孙代教育是隔代抚养的重要内容。需要注意的是,在数字化时代新家庭结构中的“隔代抚养”问题值得重视。在代际的合力下,新三代家庭结构使得家庭经济水平提高,进而增加了对年幼后代的家庭教育投资,使其获得充足的教育资源。然而,外出务工使家庭教育投资能力得到提升的同时,老年人的隔代抚养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老年人因自身局限,难以参与对孙代的实质教育过程,有可能使隔代抚养的孙代在教育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老年人缺乏数字技能与数字素养,会进一步加大老年人隔代抚养中教育参与

及教育监管的难度,造成家庭教育参与和家庭教育监管的缺位。比如,老年人因没有微信无法加入家长群,从而无法与老师及时沟通,无法及时收到各类通知,难以知悉学生的学习情况;老年人不熟悉智能设备,无法有效辅导及监管孙代,有可能加大孙代在教育中的劣势。孙代在教育中处于劣势地位,不利于农村家庭的长远发展。除了教育领域,老年人在对孙代进行生活方面的隔代照料时也会遭遇诸多不便。因此,帮助老年人习得基本的数字技能,使其在自身能力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孙代生活和教育参与的需求,促进孙代健康成长,既有利于老年人自身的福祉,也有利于后代的健康成长以及家庭的长远发展。

三、乡村数字反哺的合作动机

乡村数字反哺一方面是在村庄秩序变迁的背景下,青年农民出于家庭发展和再生产的策略考虑,对老年家庭成员传授基本数字技能,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家庭在村庄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青年农民作为家庭的中坚力量,处于核心的主导地位。数字反哺是其家庭权力的一种符号象征,通过对在家庭中处于边缘位置的老年人开展数字反哺,既满足了亲子之间的情感需求,又能够体现青年农民的能力和成就感。

1. 防范经济风险

许多农村老年人对于移动支付是心存芥蒂的。他们担忧因自己操作不当或失误造成财产损失,受到子女责怪,影响家庭关系。客观上讲,目前网络诈骗、网络陷阱比较常见,一些老年人身陷骗局当中,权益受到侵犯,许多老年人对此深恶痛绝。为防止上当受骗,一些老年人干脆同数字技术保持距离,敬而远之,还有一些老年人在使用涉及财务交易的智能程序时甚至有恐惧心理。中国人民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居民通过现金进行支付的比例约是13%。^②而这些进行现金支付的人当中多数是老年人。老年人在心理和习惯上更愿意接受真实环境里眼见为实的互动方式。同时,一些老年人对自己的身体并不自信,担心自己并不是总能保持头脑清楚,如果精力不济或稍不注意,操作智能程序时就有可能失误犯错,从而可能导致财产的大量损失。对于移动支付账户上的数字货币数量的增减,老年人也觉得比较抽象,顾虑较多。可见,老年人对数字技术

的学习持保留态度。

即便如此,乡村社会的数字化进程也不能抛弃老年人,乡村青年对老年人的数字反哺可以理解为农村家庭应对社会数字化的一种实践逻辑。只有通过数字反哺,助力老年人融入数字社会,才能在数字化进程中最大限度地完成社会资本的转换与积累,实现家庭生产的最优化。农民的家庭生计策略在于利用家庭劳动力实现经济收入最大化。由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不尽相同,农村家庭需要依据其实际情况能动地进行代际分工。随着年纪的增大,农村老年人劳动能力趋于减弱,不再是促进家庭生计发展的主要力量。虽然不再从事重体力劳动,但农村老年人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早已形成勤劳的生活习惯,他们会继续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农业劳动生产,在家庭生计中扮演着相对次要的角色。代际分工的策略之一就是让老年人以自家农产品为商品参与市场交换,而目前的市场交换主要通过移动支付来实现。如若没有相应的技术支持比如缺少收款码,移动支付将无法进行,这就有可能导致交易中断,从而难以实现家庭收入的最大化。另外,缺乏相应的数字素养也会使老年人在市场交易中成为弱势的一方,一些交易对象有可能利用老年人缺乏移动支付知识而欺骗他们,少付或者不付商品费用的情况时有发生,给老年人造成经济损失。向老年人传授的数字技能包括申请收款码、识别收款信息等安全支付知识,这是基于家庭发展的经济理性行为。因此,维护家庭经济收入最大化、规避风险损失,成为青年对家庭老年成员数字反哺的重要动机之一。

2. 代际权力转移

家庭政治是家庭策略的另一构成要素。农村家庭要在快速发展变迁的村庄中适应社会转型,保持优势地位,就必须跟上时代发展步伐,让家庭骨干成员发挥主导作用,对家庭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实现家庭效益最大化。在传统农业生产中,由于缺乏科学知识与信息,经验积累尤为重要,因此年长者在家庭乃至村庄中具有较高威望,扮演着“掌舵人”的角色,主导家庭的发展方向。在数字社会,技术更新换代快,缺少经验带来的局限可以通过现代技术加以弥补。只有掌握数字技术,跟上社会发展脚步,才能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在社会竞争中保持较强的竞争力。在此背景下,青年的优势日益显现,他们学习

能力及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能掌握更多的数字社会资本。而农村老年人学习数字技术较为吃力,在融入数字社会时处在落后状态,担负不起家庭主导者的角色。出于家庭整体利益的考量,老年人会主动“让权”,将家庭权力传递给青年,这是农村家庭为发展采取的家庭政治策略。

家庭的政治转型不仅是老年人主动“让权”的过程,也是乡村青年主动争取的结果。在日常生活互动中,乡村青年会通过一系列的行为策略,实现家庭权力的代际传递与转移,其中数字反哺就是他们获取家庭权力的重要方式。当代青年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不愿盲目服从长辈权威,想将家庭权力获取与传递的时间节点提前,以更早地在家庭中拥有话语权与决策权。基于此动机,他们会抓住各种机会建构自身形象,在日常生活互动中完成权力转移。数字技术等新事物成为乡村青年实现此目标的重要领域,在数字反哺中青年成为知识主体,扮演“传授者”的角色,老年人则扮演“学习者”的角色,在这种文化反向传递中青年成为权威,逐渐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在数字反哺的过程中,家庭权力结构发生转变,这种转变不是转为子代掌握绝对的话语权,而是显现出平权的特点。数字反哺的发生对家庭权力结构的影响在于引发家庭权力关系从单向权威向双向权威的转变。^⑬乡村青年所采取的包括数字反哺在内的行为策略,在农村家庭日常互动中逐步推动家庭政治向现代转型,满足他们更早获取家庭支配权的需求,也符合农村家庭的发展方向。

3. 体验自我实现

农村家庭不仅具有生产功能,还具有生活功能。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的途径之一就是要理性决策资源配置效率,使家庭生产功能取得最优收益。基于农村家庭劳动力资源的实际状况,在做出理性策略安排时,老年群体往往退出直接关系经济收入的劳动。但在家庭的生活功能方面,老年人仍需要提供相应的帮助与支持。对老年人数字反哺是在家庭文化延续以及自我实现需求作用下的主动选择。虽然核心家庭本位已经成为乡村社会结构的文化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伦理本位不复存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家本位观念占据着重要地位,“尊老爱幼”的家庭伦理在当下社会仍然具有很强的韧性。

面对数字技术,农村老年人对于自己掌握高技术含量的智能设备普遍信心不足,担心自己学习能

力不够,跟不上时代步伐,呈现出较低水平的自我效能感。由于身体老化,老年人客观上认知能力降低,掌握数字技术难度较大。乡村青年能够感知到老年人在数字学习中的难处,基于家庭伦理与文化惯习,不仅“尊老”,也会进一步“助老”,帮助老年人学习数字技术从而融入数字社会。同时,家庭策略关注家庭决策的产生过程,最终目的是实现家庭收益最大化,在此过程中也必须关注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以及互动中体现出来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家庭关系影响家庭的凝聚力,家庭凝聚力是实现家庭策略的重要保障,代际的良性互动、互助与互惠对于和谐家庭关系、提高家庭凝聚力具有正向作用,因此对于家庭扩大再生产也具有增益效果。对老年人的数字反哺能够增强代际沟通,弥合数字代沟,和谐家庭关系,减少家庭矛盾。在此意义上,数字反哺的行为选择也是一种家庭文化及生活策略,能够间接推动家庭发展。

另外,从功能主义角度来看,家庭代际关系网络对于家庭成员具有非常重要的福利价值和文化意义。^④数字反哺能够获得“双赢”的效果。一方面,老年人从数字技术的学习交流中获得了开阔视野、丰富生活的直接福利,促进了村庄的数字参与、公共生活的活跃,也优化了家庭发展策略和强化代际责任的文化氛围。另一方面,乡村青年因此也收获了具有实际价值的正向反馈作用。青年处在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激烈的社会竞争环境中既有许多前进的机会和对未来的积极预期,也容易遭受挫败和生活失意,其既想尽早从家庭中独立以显示自己的成熟和能力,又存在对家庭依恋的心理。乡村青年同样如此,表现出明显的自我认同需要与自我实现期待。在数字反哺的代际合作中,青年能直接感知自我能力并加以展示,这使得其特定的成就感跃然而升,从满足老年人需要的乐趣中发现自己被需要与被依赖的价值,由此进一步深切体会到浓厚的代际亲情,并将这种强社会关系所蕴含的积极力量用于其他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展。可以说,数字反哺的代际合作有利于青年对家庭的美好眷念,满足他们特定时期的情感需求。

四、乡村数字反哺的行为选择

在城市,社区往往有条件组织老年人进行数字技术的简单培训学习,热心的志愿者也会向老年人

传授一些智能手机的操作技能。但是在农村,由于村庄公共性消减等因素的限制,老年人能够获得来自外界的数字技术学习机会很少,较为常见的途径是家庭内部青年向老年人开展数字反哺,通常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1. 数字反哺注重实用性

乡村数字反哺遵循学用结合的行为模式,采取数字业务代办与传授技能同步进行的方法,兼顾老年人的年龄及身体状况。低、高龄老年人的数字技术学习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一般来说,低龄老年人身体状况尚可,具有一定的认知和操作能力,对智能设备从心理上比较接纳。他们愿意接受子女淘汰下来的二手机,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也会让子女帮助购买价格较低的智能机。这些老年人学习数字技术起初需要子女完全包办代替。随着对智能手机的使用越来越熟悉,他们会逐渐减少子女代办的次数,自我学会初级的使用技能,只是在操作一些陌生或涉及经济财务等事宜时才由子女代办,其他娱乐型、消遣式等基本的操作使用都由自己来完成。青年子代对低龄老年人的数字反哺较为积极,他们会给老年人的手机安装下载好基本的常用软件,帮助其申请好QQ、微信等社交账号,同时把初级的操作程序和方法演示给老年人,确保老年人拿来手机就可以使用。而低龄老年人因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对于使用智能手机进行社会交往和保持家庭沟通较为积极,学习意愿也比较强烈,他们乐意主动向子代寻求数字反哺,无形中也强化了亲子关系。对于各类软件的使用,低龄老年人数字反哺的需求是不同的。在QQ、微信、抖音等社交软件的使用方面,低龄老年人只需要子代将程序安装好,教会其如何进行操作。在淘宝、京东、拼多多等购物消费平台的使用方面,低龄老年人较为谨慎,一般不去主动学习,若有购物需求时他们更愿意让子代直接帮助完成。此外,如果需要涉及金钱的移动支付时,低龄老年人都要求子代来替代完成或者在场辅导完成。总体上,低龄老年人具有合理的判断能力和风险意识。为了满足休闲娱乐和人际交往的需要,他们乐意主动向子代请教,并认真学习和熟悉基本的操作方法。但如果涉及经济利益的输出活动,他们表现出较强的风险警惕意识,子代也会不厌其烦地告诫老年人,涉及金钱交易的时候一定要由青年人来过问、辅助,以保护家庭的核心利益。

高龄老年人由于自然衰老,在认知能力和操作能力方面较之低龄老年人都有一定幅度的降低,他们对于智能手机的使用与操作意愿较低,整体上处在智能手机接入阶段的前期,能够享受的数字技术红利非常有限。高龄老年人极少主动出资购买智能手机,少数高龄老年人虽然有子女淘汰下来的二手机,但平时使用次数很少,他们对于了解和掌握智能手机及数字技术基本上没有热情。在村庄生活中,他们偶然遇到需要激活社保卡、移动支付等问题时,主要由自己的子女亲属全程代办。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逐步开展,村庄数字化事务开始增多,农村高龄老年人在社会保障、就医看诊、银行储蓄等方面也遇到一些智能操作方面的难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高龄老年人习惯依赖自己的子女完成上述涉及数字技术操作的事务。子女也出于家庭代际责任和保护家庭经济利益的考虑,在付出少量时间成本的情况下,帮助高龄老年人完成数字操作。此外,从目前农村家庭的实际状况看,高龄老年人通常在家庭中处于边缘位置,基本上难以从事农业劳动,也无法为家庭带来更多的经济收入,呈现出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萎缩的趋势,加之高龄老年人认知能力衰减较快,子代对其进行数字反哺的意愿偏低。一方面,子代认为高龄老年人没有学习掌握智能手机的必要;另一方面,高龄老年人自己也认为没有学习的必要。因为不仅投入的时间精力无法带来相应的收益回报,增加不了家庭发展利益,而且使用智能手机不当还有可能给高龄老年人带来较重的心理负担。因此,对高龄老年人数字反哺的行为选择重点在于,为高龄老年人处理为数不多的数字化事务,注意规避财产风险,避免家庭资源遭受损失。

总体上,现阶段乡村数字反哺的实用性特点表现得较为显著。数字反哺的代际合作一方面考虑到低、高龄老年人的身体状况、认知能力和实际需求等因素,另一方面从有利于家庭发展策略的最优选项出发。农村低龄老年人在身体健康允许的条件下,通常还会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生产,乡土社会塑造的勤劳习惯以及“恩往下流”的强代际责任,促使他们在家庭发展中仍承担一定的创造收入与增加资源的任务。随着乡村数字社会的建设,低龄老年人也需要适应时代发展的变化,通过学习和掌握基本的数字技术操作,尽可能为家庭争取更多的信息资源和数字红利,同时也为自己的老年生活维系必要的

网络交往和休闲空间。而对于高龄老年人来说,他们不仅不能从事低强度的劳动生产,而且很多时候还需要子代付出时间精力去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当高龄老年人难以为家庭直接创造经济收入和增加资源时,家庭对他们的期望是“不添太大麻烦”就行,子代对他们的数字反哺保留最低的要求,比如教会他们接打电话、对有兴趣的高龄老年人教会他们利用手机获得一些娱乐方面的资讯等。无论低龄还是高龄老年人,数字反哺的实用性都重视规避经济风险,避免家庭资源的损失。当涉及需要通过数字化方式处理金钱等物质利益的事务时,子代通常会陪伴老年人到现场代为办理。可以说,实用性的乡村数字反哺符合农村老年人的实际情况,在向他们传授基本数字技能的同时,满足了他们融入数字社会的初级需要,维系数字乡村必要的网络人际交往,有利于老年人晚年的幸福生活。

2. 沟通传授中物质支持与情感支持并重

社会支持具有普遍的增益效果。随着个体获得社会支持的增多,个体从多方面都会有所收益。^⑤在乡村数字反哺的代际合作中,青年往往愿意主动提供物质支持与情感支持,这能极大地帮助老年人克服数字技术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难题。代际合作中的物质支持为情感支持奠定了基础,情感支持则对农村老年人初步融入数字社会发挥着关键作用。对老年人的物质支持主要指帮助有需求的老年人购买合适的智能手机,或者将自己淘汰闲置的二手机赠送给老年人,从物质层面上实现老年人对于数字活动的基本接入。在具备基本的物质条件后,青年开始对老年人进行具体的数字反哺,比如告诉老年人使用手机的基本操作、调试好网络运行、下载常用的 App、申请社交账号等。家庭是进行情感交流和获得精神慰藉的重要载体,成年子女的代际情感支持对老年人的健康与福利发挥了社会经济支持无法替代的作用。^⑥因为在一对一的数字反哺活动中,代际合作双方都体验到各自的情感满足。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家庭成员,通过强社会关系的角色身份向老年人输送浓厚的情感支持,可以强化老年人的学习热情和操作动机,提升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增强其对数字技术的使用信心。由此,接受情感支持越多的老年人在家庭成员的鼓励下,越表现出更大的好奇心,愿意尝试使用智能手机完成基本的交往或交易活动,丰富自己的操作技能。

心理障碍是农村老年人数字技术学习时的“拦路虎”。数字反哺的代际合作首先需要年轻一代意识到自己的代际责任,清醒把握老年人的内心活动和情感需求。青年人在自然而然接受新鲜事物的时候应当多加理解老年人的客观处境,在手把手开展技能传授时要坚持情感式的沟通传授,在没有时间压力的情况下循序渐进,保持平和耐心,以鼓励为主,从容易掌握的操作入手,以成功操作的积极反馈增加老年人学习的乐趣和信心。从目前乡村社会数字反哺的情况看,年轻一代逐步从以往重视物质支持过渡到物质和情感支持并重,在日常生活中利用数字反哺的机会增进家庭的良好互动氛围,加强家庭发展的力量。现实中,当低龄老年人慢慢走出智能手机使用不适应的初期,能够熟练使用并享受其带来的诸多便利之后,他们就会愿意使用智能手机参与乡村的数字生活并享受网络世界提供的信息服务。可以说,年轻一代提供的适度的物质与情感支持,为数字反哺的代际合作铺平了前进道路。

3. 隔代反哺比较普遍

随着生活水平和卫生条件的改善,加上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民体力劳动的强度下降,农村老年人的平均寿命提高,许多家庭多代共同生活的时间延长,家庭代际关系不再是局限于两代人之间的单向或双向关系,而发展到了多代互动的复杂关系形态。农村绝大部分高龄老年人的孙代已经成年,他们在对高龄老年人的数字反哺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农村形成了“隔代反哺”的现象。这种“隔代反哺”现象出现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青年孙代而言,一方面,他们属于使用数字技术的中坚力量,有能力进行数字反哺。另一方面,虽然已经成年,但是他们或是还在读大学或是刚刚进入社会或是刚刚组建家庭,生活压力相对较小,有较为充足的时间与精力进行数字反哺。另外,相较于父辈,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思想观念较为先进,更能感知老年生活的多种可能,因此主动反哺的意愿更加强烈。“有才”“有闲”又“有心”的孙代,具备展开数字反哺的主客观条件,促使反哺发生。第二,就中年子代而言,高龄老年人的子代属于中老年人,他们是农村家庭的“顶梁柱”,承担着整个家庭发展的任务,他们自身数字素养也不高,属于入门级别,在使用过程中遇到困难还需要向青年寻求帮助,向老年人传授数字技术在时间、精力和耐心方面

均不一定比孙代更有优势。第三,就老年人自身而言,他们在数字技术方面遇到困难或者有需求时,往往也更愿意向孙代寻求帮助,这与农村家庭中传统的权威观念有关。虽然大部分高龄老年人已经远离家庭权力中心,但在面对子代时还是希望能够保持自己作为父辈的威严,不愿意轻易向子代示弱并寻求帮助,而在面对孙代时他们的心态就完全不同,“隔代亲”的特殊情感既让孙代愿意主动反哺,也让老年人非常愿意学习,感受家庭的天伦之乐。老年人愿意扮演慈爱祖代的角色,不会“倚老卖老”端着权威架子,他们会更加坦诚、更加直接地向孙代表达自己的需求,尤其在数字技术方面发生兴趣及遇到困难时,更愿意向孙代寻求帮助。

同时,青年孙代与高龄老年祖代之间存在隔代抚育的情感基础。当下农村高龄老年人的孙代多为“95后”甚至“00后”,他们年幼时正处于打工经济兴起、村庄内部竞争加速的阶段,父代大多选择外出务工积累家庭财富,祖代隔代抚养情况非常普遍。幼年时期的悉心照料使得孙代与祖代之间产生深厚的感情,他们之间“隔代亲”的天然情感优势也使得孙代在长大成年之后出于朴素情感与回馈心态去主动了解和关注祖代的生活需求。当发觉祖代遭遇数字技术使用的困境时,孙代愿意积极主动反哺祖代,让祖代摆脱学习数字技术的烦恼。显然,青年孙代与高龄祖代之间有良好的沟通契机,更容易产生“选择性亲和”,使隔代反哺成为乡村数字社会一道靓丽的风景。

4. 反哺时间集中在节假日

贝克尔的家庭生产理论认为,家庭生产决策行为主要受时间和货币性收入两个关键性因素的影响,家庭成员通过对上述两大资源的有效调配实现家庭生产行为效应的最大化。^①中国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许多村庄的大多数青年都外出务工或求学,老年人往往留守在村庄。农村家庭成员间的联系互动呈现出典型的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叠加的特性。农村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普遍很弱,加之身体感官的劣势,通过虚拟空间进行非身体在场的数字反哺难度较大,也不切合实际,对老年人的数字反哺在同一物理空间中面对面开展会比较有效。乡村二代、三代人口是数字反哺的主力军,但他们平时忙于生计或学业,较少有大段时间以身体在场的方式“手把手”地直接为老年人传授

操作技能,无法营造出生动活泼的家庭“数字氛围”。有时即使子代和孙代在当地工作和学习,由于承担着家庭发展的重任或者学业紧张,他们平时在家的时间非常有限,无暇抽出专门的时间对老年人进行数字反哺。因此,在家乡工作和上学的子代、孙代对老年人的数字反哺多发生在节假日期间,在外地求学或务工的子代、孙代对老年人的数字反哺主要集中在春节期间。乡村二代、三代人口将对老年人数字反哺的时间安排在节假日是其对资源理性调配的结果。农村青年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家庭收入的最大化,促进家庭的生存与发展,为此需要将主要时间、精力投入到家庭生产活动中。而利用节假日的闲暇时间来强化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交往和情感联结,特别是用于补偿平时生活中对老年人缺失的情感关怀,成为其最好的选择。从学习的有效性来说,持续反复的数字反哺更有利于老年人取得良好的学习成果,但由于代际共处的日常时间有限,乡村二代、三代人口高效利用节假日的闲暇时间主动对老年人进行反哺十分必要,以弥补青年长时间不在场造成的反哺空缺。

从家庭发展利益、老年人认知特点以及村庄年轻一代的主体责任出发,乡村数字反哺的代际合作呈现良好的发展趋势,通过“授鱼”与“授渔”并重、物质支持与情感支持兼顾、隔代反哺多于子代反哺、利用节假日闲暇时间反哺的方式,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逐渐熟悉和掌握了初步的数字技术。针对低龄老年人的数字反哺大致循着“数字技术流行—(子代帮助)获得数字产品—子代代办+教基本操作—主动学习意愿较强—子代继续数字反哺—获取新的数字技能”的路径,对高龄老年人的数字反哺则循着“面对数字技术存在困难—子代、孙代代办—逐渐拥有智能手机—主动学习意愿较低—子代、孙代主动反哺—习得基本技能”的路径。乡村社会的数字反哺是家庭权衡其发展策略后主动做出的行为选择,既有理性的考量,也包括感性关怀,体现出青年农民自身的主体性与农村家庭内部的能动性。

五、结语

技术创新的潮流势不可挡,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同样如此。不断进步的数字技术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谁能置身其外。体现人类文明的数字技术成为创造现代美好社会的重要物质条件。本

质上,进步中的数字技术如同所有其他类型的技术创新一样,能够服务于人们安全、高效、便捷和舒适的现代生活。^⑩不过,即便如此,新式技术及其衍生的服务产品在世俗日常生活中对所有人群铺展开来不会一帆风顺,而需要一段适应时间,特别是针对某些群体而言。老年人接受和使用数字技术就是一个严肃的社会话题。

乡村青年为了实现家庭与自身的最优发展,基于家庭经济、家庭政治以及家庭生活策略的考量,采取各种行为策略,对家庭中的老年人开展数字反哺。值得关注的是,老年群体在年龄、文化程度以及经济状况等方面存在异质性,开展数字反哺时不能一概而论。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对数字技术的需求以及学习能力不同,数字反哺路径不同,并且呈现出不同的反哺特点。青年应当根据他们的不同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反哺。对于低龄老年人可以在反哺过程中逐步加深学习的深度,进行普适性技能传授,对于高龄老年人则需主动开展风险较低、娱乐功能为主的反哺。教育能够提高个体认知的可塑性,延缓认知老化,对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具有正向影响。而良好的经济状况能够使个体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与社会支持。因此,受教育程度较低、经济状况较差的老年群体学习能力相对较弱且更加依赖家庭中的数字反哺,青年在反哺中应当给予其更多的家庭支持,向其传授较为基础的数字技能,以满足其生活、娱乐需求。对于在教育和经济状况方面具有相对优势的老年群体,他们学习能力较强且能获得较多的社会支持,可以帮助其深入探索数字技术的其他功能,掌握更多数字技能,帮助他们高效、顺利融入数字社会,追赶时代潮流,满足其发展性需求。同时,对农村老年人的数字反哺也需要遵循村庄的现实情况与家庭发展目标,构建既符合客观现实又符合老年人自身需求且最有利于家庭发展的数字反哺机制。在数字反哺中要关注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增加对他们的情感支持,发挥乡村青年在数字反哺过程中的优势,提高他们主动反哺的意识,从而充分利用闲暇时间进行反哺。家庭策略理论强调社会变迁过程中家庭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因此在家庭策略驱动下农村家庭内部青年对老年人的数字反哺方式与形态并非一成不变,它也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化,需要家庭成员内部依据社会发展状况随时能动地进行调整,适应社会发展变迁规律并推动家庭向上流动。

注释

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1年8月27日发布。②徐倩:《老龄数字鸿沟根源剖析与数字包容社会构建方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杨斌、金栋昌:《老年数字鸿沟:表现形式、动因探寻及弥合路径》,《中州学刊》2021年第12期;陆杰华、韦晓丹:《老年数字鸿沟治理的分析框架、理念及其路径选择——基于数字鸿沟和知沟理论视角》,《人口研究》2021年第3期。③景义新、孙健:《数字化、老龄化与代际互动传播——视听新媒体环境下的数字反哺分析》,《当代传播》2020年第4期;洪杰文、李欣:《微信在农村家庭中的“反哺”传播——基于山西省陈区村的考察》,《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10期。④郑超月、徐晓婕:《数字反哺机制研究——以95后及其父母的短视频使用为例》,《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3期;安利利、王兆鑫:《孝道与平权:数字鸿沟中的文化反哺与再哺育——大学生与父母在微信平台上的亲子关系研究》,《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⑤陈雅赛、杨艳、于淑妮:《“啃老”与“孝道”:青年与父母经济帮助关系中的数字反哺获得现象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5期;王波伟、袁向玲:《“向孩子学习”:社交媒体使用中青少年对亲代的技术反哺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于潇、刘澍:《老年人数字鸿沟与家庭支持——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6期。⑥赵庆婷、高昊:《农村地区老年人短视频使用的数字反哺现象研究——基于山西省中上达村的考察》,《传媒观察》2021年第9期;周裕琼、丁海琼:《中国家庭三代数字反哺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3期。⑦牛耀红:《社区再造:微信群与乡村秩序建构——基于公共传播分析框架》,《新闻大学》2018年第5期。⑧Tsipi Heart, E. Kalderon. Older Adults: Are

They Ready to Adopt Health-related I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Informatics*, 2011, Vol.82, No.11; Maria Karavidas, Nicholas K. Lim, Steve L. Katsikas. The Effects of Computers on Older Adult User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05, Vol.21, No.5, pp.697-711. ⑨S. Pettigrew, M. Roberts. Addressing Loneliness in Later Life. *Aging & Mental Health*, 2008, Vol.12, No.3, p302-309. ⑩Patricia A. Tun, Margie E. Lachma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mputer Use and Cognition Across Adulthood; Use It so You won't Lose It?. *Psychology & Aging*, 2010, Vol.25, No.3. p.560. ⑪Donald J. Treiman.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Sociological Inquiry*, 1970, Vol.40, No.2. pp.207-234. ⑫魏晔:《央行发公告强调不得拒收现金 约13%中国居民仍主要通过现金支付》,中国新闻网, <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0/12-15/9362869.shtml>, 2020年12月15日。⑬朱秀凌:《手机技术反哺、亲子沟通与父母教养方式——基于技术接受与使用整合模型的分析》,《新闻大学》2018年第4期。⑭吴帆、王琳:《中国家庭多代际关系网络的图景与形态——基于6个典型家庭的分析》,《人口研究》2021年第4期。⑮韩雯、宋亦芳:《基于社会支持理论的老年教育研究》,《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年第28期。⑯王小增、杜兴艳、王林萍:《亲近还是疏远:新农保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情感支持的影响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⑰[美]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等译,格致出版社,2008年,第161—163页。⑱Barbara S. Zaunbrecher, S. Kowalewski, M. Ziefle. The Willingness to Adopt Technologie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Technical Self-efficacy on Acceptanc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 - Computer Interaction* Springer, Cham, 2014.

责任编辑:海玉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on and Behavior Choice of Rural Digital Feedback

Wu Lin Zhu Boyu

Abstract: Rural youth helping the elderly integrate into the digital societ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building a digital village, which can play a fundament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village governance and realizing active aging. The digital feedback of rural families is based on the triple cooperation of maintaining economic interests, adjusting family politics, and carrying out daily life. The intergenerational behavior of digital feedback shows the practicability of digital technology learning, equal emphasis on material support and emotional support in communication and teaching, intergenerational feedback and the focus of feedback time on holidays. Mobilizing domestic resources for digital feedback is one of the family strategie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rural elderly. It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abi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of rural families, but also help to achieve family development goals. The initial improvement of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their integration into the digital society, but also enable young people to shoulder intergener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Key words: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on; digital literacy; digital feedback; family strategy